

我在北京有张床

I'VE GOT NOTHING BUT A BED IN BEIJING 李波 著

手机阅读

手机阅读：开店就展正读报案。
移动支付：发送短信，8080，至10086，即可开通专区。
移动支付：扫码支付，8080，至10086，即可开通专区。
移动支付：扫码支付，8080，至10086，即可开通专区。
移动支付：扫码支付，8080，至10086，即可开通专区。

广场股宽广舒适

官股股富丽堂皇

我在北京有张床

李波

作家出版社

目 录

引子.....	4
第 1 章.....	5
第 2 章.....	18
第 3 章.....	28
第 4 章.....	33
第 5 章.....	40
第 6 章.....	45
第 7 章.....	55
第 8 章.....	68
第 9 章.....	71
第 10 章.....	80
第 11 章.....	87
第 12 章.....	97
第 13 章.....	106
第 14 章.....	111
第 15 章.....	118
第 16 章.....	123
第 17 章.....	126
第 18 章.....	129
第 19 章.....	139
第 20 章.....	145
第 21 章.....	153
第 22 章.....	156
第 23 章.....	161
第 24 章.....	167
第 25 章.....	173
第 26 章.....	182
第 27 章.....	191
第 28 章.....	196
第 29 章.....	200
第 30 章.....	205
第 31 章.....	210
第 32 章.....	218
第 33 章.....	225
第 34 章.....	235
第 35 章.....	239
第 36 章.....	245
第 37 章.....	249
第 38 章.....	255
第 39 章.....	265

第 40 章	273
第 41 章	279
第 42 章	290
第 43 章	297
第 44 章	308
第 45 章	318
第 46 章	325

引子

2010 年春，我和太太詹妮弗·艾伦——不，现在她叫詹妮弗·戈从纽约飞抵北京。因为四川大地震和 H1N1 流感，这是拖延了三年的旅行。我们先在美国驾车旅行了十多个州，甚至到了美国的天涯海角——佛罗里达小岛 KeyWest。海明威年轻时在此“南漂”十年，完成《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等巨著。

波音 777 飞临北京时，碰巧风和日丽，靠近机舱的老外们发出片片赞叹声。我心头为之一松，如果以一场沙尘暴为太太接风，实在难堪。机腹下庞大的城市，像一堆堆微型盆景、积木玩具和机械装置展现开来；高速公路上连绵不绝的车流蚯蚓般蠕动、甲壳虫般闪耀着破碎的亮点。这个庞然大物越来越肥大，像失去控制的甲状腺和骨质增生。

京漂八年，这个城市磨盘一样将我碾个粉碎，但在“夷人”面前，精神错乱般的自大狂还是不可救药地发作。我就像一个长工炫耀老财主的产业似的对太太说：“看，那是第三号航站楼，全球最大的！”

太太循着我的手指望去，赞叹：“Amazing（真棒）！”

“世界上没几个城市可以在块头上和北京比，纽约、芝加哥小 Case（事情，案例）。”我说，太太深信不疑地点头。

“北京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 Pancake 饼。”

“什么？饼？最大的饼？”詹妮弗被弄蒙了。

“这是个 Metaphor（隐喻），就是说北京是全世界最大的建筑工地。”我解释道，“中国使用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钢材和近一半的水泥，很多又用在了北京，越来越大，就像摊大饼……”

“就像二战前后的美国。”

“我在这里住了八年。”

“唔——这是你的地盘。”

“对，我的磨盘。”我鼻子发酸，低下头，捂住眼睛。飞机开始下降，耳朵轰鸣起来，隐隐作痛。瞬间，一股看不见的力量猛然入侵身体，让我灵窍分离。

第1章

我在社会上晃荡了五年，终于得到单位一纸通知。通知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为深化企业改革，减员增效，和四十五岁以下职工一律解除劳动合同。通知限我一月内结清手续。大棒之外还有糖果，通知云：如在规定时间内解约，可获两千大洋奖赏，并按工龄每年补偿一千大洋；晚签一天扣一百大洋，扣完为止。如果你要叫板，理论上讲有两种前途：一、一文钱拿不到，合同一样解除；二、破坏社会秩序，移送有关部门处理。

那一段时间，天天都是企业改制的新闻，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卖字当头，以股为主”一类标语，活像一场新的运动席卷而来。一些有政治觉悟和商业嗅觉的色情场所也打出标语“卖字当头，以‘股’为主”。所谓改制，说白了就是把国企强制性“卖”给公仆，书记厂长经理什么的；主人则必须买断工龄，再带资上岗，等于自己给自己发工资，还要对“新兴资本家”感恩戴德。

这把在头上晃悠了几年的大刀终于砍下来了。我一点也不吃惊，在这个古怪的话语系统中，任何别扭的事情都可以弄得合情合理甚至大义凛然。比如，把你关进牛棚，那是为你好；变相劳改叫“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砸了你的饭碗不叫失业而叫“下岗”。这样的高明是显而易见的，你失去“岗位”并不等于失去“职业”，就像你失去“老婆”，并不等于失去“妻子”。所以即使你饿得眼冒金星，看上去却红光满面；即使你荒成了手淫犯，也得装出一副西门庆的模样，你也就失去了抱怨的权利。

这样一算，我可拿七千大洋补偿后滚蛋。这笔巨款，在当时可买一部二流手机供你招摇一阵；买几头注水猪，可以吃个一年半载；到偏远山区买个有点智障的媳妇，也可以与你共度余生啦。

这是家小国企，我到这儿工作纯属意外。我这个师范生，本该去教书育人或误人子弟的干活，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这行当很不体面，师范被称为“稀饭”，若避瘟神。报考“稀饭”学院，纯粹为了换个干部身份。那会儿考大学可不像现在，百分之五的录取率，活生生把人逼疯，我有两个同学因此自杀。我智力尚属正常，学得口吐白沫神经紊乱，还补习了一回才挤上独木桥——现在还未彻底痊愈的脑残，就是那时候弄出来的。哪像现在，凡精神病院和垃圾站不收的，大学都收。

毕业后，有好爹好妈的，成了公务员；差一点的，进垄断企业或事业单位；再差的，送个礼赔个笑（或许陪个睡）也能进市区或郊区学校，遥望灯红酒绿流口水；最倒霉的，一律去边远山区。囊城本已属老少边穷地区，老少边穷的平方，基本上判处无期徒刑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一辈子。前途也有两个：一、成仙；二、成仙不成，成神农架人。

我本来还是愿意“吃粉笔灰”的。我这人低级趣味严重，有话痨的毛病，天生具备谎话说一千遍面不红心不跳的教育工作者素质。一旦登上讲台，立马获得话语霸权。当初老师怎么折磨我的，我要连本带利收回来，社会学管这叫婆媳理论，经济学术语叫隔代收租。想到一拨又一拨被绑架了的蠢货规规矩矩听我口吐莲花唾沫横飞，哪怕是假装的虔诚，都会让我产生真实的成就感。另外，不坐班再加上两个假期的福利，还是可以挖点自留地经营个花果山什么的。

但我如此庸俗的要求也被剥夺了。本来当地一所成人高校发了公函要我去，但教育局非要我去“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我这俗坯可不想成劳什子仙。我压根就不想给他们好处，一见那脑满肠肥一脸正义的脸我 TMD（注：一句口头禅，疑似一句国骂。全书同。）就想吐。别的同学都上班几个月了，我还没着落。我妈急了，我也拧不过。经过踩点，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我拎着腊肉香肠好酒好烟特级挂面鬼鬼祟祟来到教育局大院，小心翼翼地敲开一个

头儿的家门。我的确比较冒险，因为压根就不认识此人也没中间人。半晌，一个肥得如同地滚球似的娘儿们拉开门，看我的目光活像上海人家来了个苏北穷亲戚。验货后一脸鄙视：“你把我们看成什么人哪啊？”

走投无路了，老爸豁出离休干部的老脸，找到市上一分管理领导求情，赔了教育局一笔钱，才把我要到这个单位。这个掌管着城市居民某种生计的国企，随着改制风雨飘摇，我去了不到一年就屁也不是了。我莫名其妙地丧失了干部身份，还赔了一笔钱，转眼又成了下岗职工。我 TMD 亏大了！

尽管单位只给我发一百零六大洋的工资，但它并不欠我什么，因为我压根就没为它做过什么，我上班仅半年就停薪留职，去深圳晃荡了。几个月后铩羽而归。此后，无所事事的我烂醉如泥，清醒时就躲在家里看书。连《尤利西斯》、《追忆逝水年华》这么晦涩变态的意识流小说也看。中学同学冬瓜，那时就当上了书店副经理的高官，总能为我搞到我想要的书，连兰陵笑笑生的原版《金瓶梅》都弄来了，看得我通宵达旦茶饭不思。在文言文中文意淫，真 TMD 别有风味。

银子很快花光了，一同学介绍我去歌厅以每晚十元外加提成的方式出卖歌喉。晚上，我尚能在光怪陆离的灯光、靡软亢奋的歌声、迷乱扭曲的脸嘴和五彩斑斓的酒精中掩饰自我，漫长的白天却像剃刀一样舔舐着我的寂寞。二十五岁时一个穷极无聊的上午，躺在床上的我填下了自我心理抚摸的第一个格子。不到半年，居然鼓捣出三十余万个格子来，顿感轻松许多。治疗空虚的最好办法就是爬格子，那由格子组成的迷宫和深渊，你填到死也没底。真 TMD 不自量力，除了内部刊物上的八股文，我还只字未发呢。除了让自己晕一场，也就扔在那里了。

停薪留职期满后，被安排到省城办事处。办事处的通病是不办事或乱办事，补助费却一点也不含糊。省城补助标准高，按我当时的混混眼界和小农格局，那一段我挺阔绰，整天和哥们儿到处晃悠，从这帮闲人和这个闲城那里我沾染了不少恶习。不到一年，办事处被我的顶头上司活活给办垮，我依依不舍地回到蒙城，再次成了多余的人。经理给我指了两条光明大道：到一家分店去卖油盐酱醋外带挂面烧饼，或自己承包一家小餐馆，门面由公司出，要么安置几个工人，要么缴纳承包款。我选择了后者，当时的国企，人心已经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这是个位置偏僻、治安案件高发的地段，家人都说我疯了。果然，这家小火锅店一开张就欠账、赖账成风。见识小口气大、钱包小胃口大的食君子实在太多了。吃完饭嘴一抹，腆着脸说哥们儿今儿个健忘症又犯了，或这几天手头紧，好像龟儿子（注：龟儿子，四川方言，约相当于“王八蛋”。）以前挺阔绰似的。对这类饮食诈骗犯，坚壁清野。

另一种蹭法是钻空子。餐饮业竞争惨烈，不得不推出优惠政策，比如酒水瓜子米饭泡菜免费。好家伙，这帮“蹭爷”大大咧咧地点一两个最便宜的菜，就跟你耗上啦。你恨不得拎着啤酒瓶子，在那猪头上来个迎风绽放什么的。

其他赖账方式：吃完饭说他舅子老表是公安税务工商的，往盘子里扔蟑螂的，捂着肚子哇哇叫的，说自己刚从监狱出来要和你交个朋友的。我的政策是：确凿绝对不能惹的，算老子倒霉；可惹可不惹的，老子不吃你那一套！为了收欠账，我差点和一个刑满释放犯发生血案。说起来也就几十块钱。这厮住附近，店员去催要数次无果。我半夜去敲门，这癞皮狗操出了菜刀，咆哮他就值这个钱，有备而来的我从后背摸出两尺长的钢管。剑拔弩张之际，那厮女人牢牢抱住他，承诺次日就给钱，我就撤退了。还有一个午夜，突然店员来电话，语无伦次地报告有人吃完饭竟掏出火药枪威胁店员，还放了一枪。等我赶到，那帮歹徒早跑了，天花板上一个窟窿，店里还散发着浓重的硝烟味儿。

让这帮人渣拿去小命实在不划算，关门歇菜了。一算账，除了上缴的承包费、员工工资和填饱肚子，白忙活半年。好在各种小吏还没把这偏僻地带的鸡毛小店打上眼，否则非把我

吃成“百万富翁”不可。

随后几年，我又折腾了不少事情，有输有赢，赢大于亏，但都和这个让我滚蛋的单位没关系了。我成了一个名副其实颇有名望的社会贤达。

拿着这笔赎身钱，我漠然离开了这个从此以后和我没有任何关系的单位。和几年前我主动从单位停薪留职时尚有一丝慌乱相比，早已无所谓了。几年动荡生活下来，我早已变成了一条烂滚龙（注：烂滚龙，四川方言，有不少恶习的街头混混。），滚龙还怕泥烂吗？

香港回归不久，我拿到了下岗证，普天同庆。这是一张巴掌大小红色塑料硬壳，里面照例是标准照、生辰、单位、工龄、文化程度、政治面貌等信息，然后何时光荣下岗，最后是“有关部门”脏兮兮却很权威的印章。我深情地凝视着这个红色塑料壳，越看越兴奋，它的做工一点也不粗糙，和无数荣誉证书相比，惟一不同的是毫不起眼的“下岗”两个字。

这个国家盛产形形色色的证件、证书和证明。打我上小学开始，我就获得过无数个类似的证件，什么“三好学生”、“优秀选手”、“标兵”、“积极分子”……绝大多数人的命运就这样被一张白纸或硬壳塑料归了类画了圈，你 TMD 就必须老老实实画地为牢，终其一生。你什么货色，几斤几两，哪来哪去，全然不由你自己说了算。比如现在，自视甚高绝顶聪明的我就被宣布为落后生产力啦。

照片中的那个稚气未退的倒霉蛋看着让人别扭，转念一想，不到三十岁就退休了，你小子也算功德圆满啦。揣着新证件，有时候会忽然觉得——老子也是有来头的。

庞大的住院部大楼楼道幽深，光线昏暗，浓重的酒精和各种药剂的混合气味承载于细微的空中尘埃，扑鼻而来。病恹恹的病人、焦急的家属、淡定的白大褂和看不见的幽灵来来往往。

康复理疗室白晃晃的日光灯下，分布着十几张坚固的铁制理疗床。一个白发苍苍、慈眉善目、高大肥胖的老人躺在靠近窗口的理疗床上，床旁架子上是网线复杂的仪器，小红灯闪烁着，发出滋滋的电流声。老人宽大无力的手背上插着输液针，从头到脚插满了银针——他在接受电磁和针灸治疗。几月前一个中午，一向身强力壮的他突感半身无力，站立不稳，送至附近医院，初步诊断为突发性中风。但那个关键设备——做“血流变”测试的仪器却坏了。为了多弄几个银子，医院不让转院。我们当时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就没转。拖了一周机器才好，果然是中风，但已错过最好治疗时机。顾不上和医院纠缠，赶紧转院。中国老年人大都迷信中医，即使我搬出孙中山鲁迅郭沫若的言行，也无法说服他们。

幸好中医院并非挂羊头卖狗肉。几个月后，病情明显好转，头脑完全清醒，还能在搀扶下四处走动。虚惊一场后，我们乐观认为，他至少可以活到九十九岁。坐在旁边沙发上的母亲和我打招呼，大我四十一岁的父亲微闭的双目睁开，对我笑了笑。我凑近他看看，摸了摸额头，问了句：“今天感觉怎么样？”

“还行。今天去哪儿了？”他问。

“我发财了，一天赚了七千多。”我从皮包里拿出一沓钱，在他面前晃了晃。

“啊？你们几个都买断工龄了？怎么不和我们商量一下？”他瞪大了眼睛。

“这是改革，和你们商量又能怎样？谁让您在企业里混了一辈子，离休了才一副县级，这下革到自己头上了。”在父亲面前，我一向口无遮拦，幼年心目中的战争英雄老革命等神圣形象，早已化为一个唠唠叨叨笑咪咪的弥勒佛。

老爸被噎得无话可说，嘴角抽动一下，眼里闪出一丝悲哀。母亲给我使眼色。

“我们这些老头子，管他的，再差，死了至少还会把我们拉去烧了。现在这些年轻人怎么得了哦，不是没工作就是下岗，年纪轻轻的。”旁边一个病友老头老廖插话，他是蒙城硕果仅存的几个老红军之一，以前常来我家串门。

“那你们几个怎么办？”父亲问。

“嗨，您操那么多心干啥？您养您的病。我们不都好好的吗？姐姐开她的小餐馆，幺弟

开他的出租车，我戳我的洞洞鱼（注：戳洞洞鱼，四川方言，指没规律地挣钱，通常指小钱。）。”我说。

“洞洞鱼，那么好戳？”廖老头问。我说时好时坏，全靠运气。他饶有兴趣地问：“你在戳啥鱼？”

“那就多了，我在街上贩旧手机和电话卡，我在舞厅卖唱，我开小餐馆台球室电子游戏厅，搞传销——”

“啥？传销——？这个不好，这个不好，专害熟人。”老革命打断我，气愤地说，“我就被我侄子骗了三万，一个水龙头嘛。”

“呵呵，我也看出来啦，及时收手了，一笔也没做成。最近，我为贵党工作了。”

“贵党？”老红军有些不悦，“好像你不是我党后代似的。”

“也就您这么高看我。”我笑，“我想接您班，让吗？”

“当然，党的后代不接谁接啊？”老革命很为革命自有后来人高兴，饶有兴趣地问，“现在说说你干什么呢？”

“这个——”我从皮包里拿出一份杂志递给他，上面有一把鲜红的镰刀斧头，“这个好使，打土豪分田地厉害，戳洞洞鱼也厉害，一家伙下去，没不就范的。”

“什么意思？”他翻翻杂志，拿出老花镜。

“别信他，尽瞎吹。”我老爸说。我不以为然：“嗨，公开的秘密了嘛。”

“哦，明白了，有偿新闻嘛，还搞啊？”老头看了看目录，惊叫，“哟，这个王八蛋，不刚双规了吗？他怎么也上去了？瞧他还人五人六的。”

我一看，是一个刚落马的局长，忙解释：“杂志进印刷厂时，他还没落马，这就不是我们的责任了。”

“那倒是。”老头转移话题，“听说你学英语的，还爱写作，怎么搞成这样啊？该去外贸局或报社电视台嘛。”

“我去不了，没关系，皮（注：皮，四川方言，指钱，钞票。）也不厚。”

“哎，老头子，这就不怪你儿子啰。”老头唉声叹气。我清楚地看到父亲闭上眼睛，青筋蠕动几下，一言不发。

理疗完毕，仪器发出嘟嘟声，医生进来，关闭仪器，拔掉各种针头。护士做了一些按摩护理，我们扶起父亲，挽着他歪歪瘸瘸地回了病房。父亲又是一声叹息：“我看你咋得了哦——”

“怎么又来了？我怎么啦？我挺好的。”我嘟哝着给他剥了一根香蕉。

“怎么啦？”父亲努力伸出一根手指，“你呀，工作没了，还光杆司令一个。”

“你就打一辈子光棍？马上就三十了！”我妈也赶紧接上话头。在连续给我推销几个对象失效后，他们抓住一切机会给我施加压力。

“哪条法律规定了三十岁必须结婚？老爸不也三十二岁才结婚吗？”

“那是因为我结婚年龄不够！”我妈一急，脱口而出，“三十而立，从古至今都是这样的。你看看你中学同学，除了那个老顽童叶东江，哪个没安家立业？革娃子（即王文革）的儿子可以打酱油了，富娃子（即白成富）的儿子可以玩‘躲猫猫’游戏了……你老爸都这样了，孙子的影儿都没见着呢。”

“那有什么好羡慕的，还嫌中国人不够多啊？什么三十而立，那是因为古代人寿命短，四十岁就等死，三十能不立吗？我年轻着呢。”我没心没肺地抬杠。

“哼，不想，想也没用！现在没工作了，更没门了。”老爸居然用起了激将法。

“不是解决不了，而是不想解决——候选人太多，我要顾全大局维护团结嘛。”我一激动，夸下海口，“信不信我明后天就给你们带几个来，你们也过一把选妃子的瘾。”

“真的？”两位异口同声地问，又异口同声地答，“瞎说。”

我站起来，拿起包，硬着头皮说：“当然。我现在就去安排了。”

“你就在这里吃了吧，再详细说说。”我妈说。

“我今天赚了七千多，还吃什么食堂，改天请客。”我亲了亲老爸的额头，急赤白脸地走了。

坦率地说，孤独并不让我难堪，我的形影相吊是自找的，我管它叫“光荣孤立”。我属于高压锅焖饭——早熟型的孩子。男女之情，小学时想入非非，中学时蠢蠢欲动，大学时阴差阳错，毕业后经过两次莫名其妙无疾而终的恋爱，反倒失去了激情。那时，全民发财的狂潮再次掀起，我也摩拳擦掌，尽管大多赚吆喝，却乐此不疲。赚了钱，哥儿几个嘍聚一堂，提前过几天共产主义生活；遇到经济危机了，就赖在父母家里蹭饭吃，那时还没“啃老族”这个词，说起来我挺新潮的。

发不了财，我也想过去考研，至少可以暂时离开这个鬼地方。说实在的，我厌恶一切形式的考试。以死记硬背的方式在规定的时间内回答一帮比你蠢的混蛋提出的古怪问题、再以他们的标准答案来考查你的聪明度实在太可笑了，跟电视上那什么“幸运 250”似的。当年高考，纯粹出于社会偏见。

但此刻我走投无路。我在马列主义、国际关系和社会学之间犹豫了很久，选择了社会学。我连资料都没有找齐，复习一月匆匆上考场。凭着被敲骨吸髓的中小学填鸭教育毁掉了一半、又被指鹿为马的大学教育毁掉了另外一半的智力，我愣是没考上。连我这个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社会活动家都考不上，去 TMD 社会学吧！

考公务员为人民和人民币服务吧。可是我本为干部身份却莫名其妙弄丢了的屁民，哪里有自己的戏呢？撤了吧，免不了愤愤地想：妈的，谁动了我的干部身份？谁坏了我混吃等死的好事儿？

我原本对生命充满了虚无和荒诞感，但目睹给了我生命的老爸一天天老去——特别是中风后医生私下坦承，如遇复发随时有生命危险，我突然觉得生命是有重量、有质感、触手可及又可戛然而止的。也许正因为老年人对此感应更强烈，才执拗渴望以传宗接代的方式延续生命。我实在不想什么延续生命，至少不想延续自己的生命。自己一塌糊涂，延续干吗啊？但作为父母的生命延续体，你却不得不尊重他们的感受。我妈说得更有情味：“有个家可以互相支撑，你的心也不会那么野了。”

无聊透顶的我在餐馆吃了晚饭，在江边沙滩上转悠，胡思乱想着。白花花的江水蜿蜒流泻，凉风吹拂，晚霞西沉，碎银般的细浪泛着红彤彤的颜色。远处的山峦、建筑和树木如一幅静默画，温暖而悲凉。我登上河堤台阶，不经意钻进一临江茶楼，一个眉目清秀的女孩迎上来，将我安排在靠窗临江的座位。见我孤客一个，她有些奇怪地问：“就一人啊？”

我没好气地问：“一个人不接待吗？”

“不，只是有点奇怪，第一次遇到。”

“我姓王，排行老五。”我随口而出，她抿嘴一笑，躬身退下。

上茶后，我看着窗外的临江河堤发呆。河堤上的茶座一字排开，少数有遮阳伞，其余躲在树下或裸露着。地上落满瓜子壳、烟头、烤肉串竹签和餐巾纸。同样一杯茶，那里的价格不到茶楼三分之一。炎热、嘈杂和灰尘中，短衣短裤光着膀子趿着拖鞋的茶客，或东拉西扯地家长里短，或热火朝天搓着麻将斗着地主打着长叶子牌。在控制成本规避意义打发人生方面，咱中国人有着异乎寻常的天赋和行动力。我无意识地朝藤椅沙发上一躺，跷起二郎腿，猛然看见这个女招待就站在我身后，吓了我一跳。我问：“你怎么站这儿？”

“我不站这儿站哪儿？这是我的工作。”她笑，上前给我添茶。

我很不自然，就说：“花二十块钱，还让人在旁边站着，这是剥削阶级的生活方式。——你能不能坐着？”

她很为难：“不行，这是茶楼规定。”

“那你去服务别人吧，我有胳膊有腿的。”

“那边有人，这边归我，就你一个客人。”

“那我赚了，超值服务。”我开玩笑，喝了几口茶，半坐半躺，打量起这女子来。她白净，瘦筋筋的，颇为端庄机灵，不像当时餐馆或茶楼里打工的农村女孩。大伙都无聊，聊了起来。中国人并不忌讳打听别人的财务状况，我也有这臭毛病，女孩很是尴尬：“我都不好意思说，三百多，喝稀饭还不够。”

“干多久啦？哪儿人啊？”

“半年了。999厂的，早就不招工了。”

“以前多红火的厂啊，还洞洞厂矿呢（注：洞洞厂矿，四川方言，指三线建设时期修建的中央直属企业，因厂名常以数字代替而来。）”我帮她叹息。

“是啊，现在都垮完了，命不好嘛。”她一脸囧样。

我突发奇想，这不是我的“临时女友”吗？我试探着提出这单业务后，她露出由衷的惊讶：“你真是王老五啊？”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嘛。”我鼓励她。

“我凭啥？就为了好奇？”她有些恼了。

“好奇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可以——”我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摩挲着，做点钞状。

“居然有这事？”她惊喜地笑。

“当然，见一面一百块，就一个小时，不过你要假装亲热点。”看着诧异的她我赶紧补充，“你别误会，也就眉来眼去勾肩搭背拉拉手挽挽腰什么的。”

“啊——？”

“你只说去不去，我老爸住院呢，见一次唠叨一次。”我给她来了个上纲上线，“这也是革命人道主义，反正你也没男朋友。有电话吗？”

她满脸通红，笑而不语。我结账时，她给我一张小纸条，是个传呼号。

二十二岁的雪儿准时出现在医院门口，远看一簇跳跃的火焰，近看还乔装打扮了一番，尤其在脸盘上下了些工夫，本就颇为清秀的她又增添了几分妩媚。我心里一跳，化妆品这玩意儿真TMD助纣为虐误导众生。我正准备和她谈如何应付父母，她一把挽住我，剥夺了我演主角的机会：“我会应付的，你配合就行了。”

我一愣，想想这样也挺好。我父母惊喜地接见了这位冒牌货，拿出水果招待她，她是毫不客气地连吃了一个大苹果、一个大鸭梨和一串葡萄。雪儿对我父母问长问短，我父母的问题，她也对答如流。雪儿说我们是在溜冰场认识的，有半年了。她是一个单位打字的，父母是退休工人，自己是个独生女，中专文化，在自修大专，法律专业。雪儿说她性格内向，不喜欢打麻将，喜欢读书。

雪儿大方地和我勾肩搭背，还采取喂宠物的方式和我分食了一个橘子。雪儿看见按摩师为我老爸按摩，也去帮忙，医生说她按得有板有眼像模像样的。我口上插科打诨，心里却纳闷，如此聪明伶俐的女子怎会屈就于一个茶楼？不得不承认市场经济对人的可塑性，生活的艰辛像一把刀子，既可以把你削尖，也可以把你削平，还可以将你拦腰斩断。在我父母高高兴兴将我们送出医院后，雪儿原形毕露了，手一摊：“钱呢？”

我付了她一百块钱，她又甜甜地说：“哥，再付五十吧。”

“不是说好了吗？”我不满起来。

“哥，我给你爸按摩了快一个小时呢，这对他很有好处，那个医生都说我按得好。就是街头野店也不止这个数呢，还有往返出租车，五十块不多吧？”

“那是你自己主动的，不过我还是给你五十块。”我掏出五十块钱给她，警告她，“下次我没点头，不许单方面增加服务内容，你不能违约啊。”

“啊——？还有下次！太好了！什么时间？”她高兴地叫起来。

“可惜不是你。但你可以推荐一个。我和我老爸老妈说过，我有几个让他们择优录取。”

“哼，花花公子！”她撅起嘴巴。

“什么花花公子？都是演戏。有可能再找你，但下次不行——你有人选吗？”

“那我有什么好处？”

“我只出一百块，另外给你二十块好处费——三十吧，谁让今几个我高兴呢。”

“好吧，那你现在先给我五十块定金吧，你到时就给她八十。我找我表妹吧，不漂亮不给钱。”

媛媛并不漂亮，不开朗，呆若木鸡，一眼就看出瓷器国应试教育的后遗症，要不是我临时给老爸老妈通报了消息，加上她已经到了医院门口，我都要退货。细节无须赘述，更像一部照本宣科按部就班的木偶戏，无论是我还是我父母都一致认为，这个大学生比雪儿差远了。看老爸老妈很高兴，我又聘请了雪儿几次。她演技出众，嘴巴甜，手脚勤快。我差点以为自己挺有面子。

其实在宽慰父母的同时，我自己已经四面楚歌了。砸掉那个泥巴饭碗并不可怕，戳洞洞鱼，甚至拾废品也比那挣得多。问题是，一场突如其来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后，钱突然不好挣了，连扛着镰刀斧头都不如以前好使了。尽管我摇舌鼓唇，把这本内部机关刊物吹嘘成本地的《求是》杂志，暗示只要花点小钱，树树形象，仕途上肯定大大光明，那些比我还聪明的“猎物”们却谢绝入瓮了，明说暗示宣传未必有用，没准还会引起反效果。的确，与其让上级通过报刊间接看到自己光辉而猥琐的形象，还不如直接将银子偷偷打点上去，神不知鬼不觉，还避嫌。

斤斤计较市场回报的私有企业就别费工夫了，只能在这个欠发达地区的机关或不景气的国企里转来转去，很快就竭泽而渔，还常常出现一家杂志几名人员在同一个单位撞车的尴尬事儿。我知道，这招摇撞骗的事业难以走进新时代了。

有人拉我去做少儿英语培训，我拒绝了。我实在无法殚精竭虑歇斯底里地和一帮流着鼻涕穿着开裆裤的小屁孩厮混在一起。我妈看见一则广告，一所中学在招英语代课老师，按课时付酬，每课时十块大洋。我听了直摇头。想当初，我哭着喊着想去教书，那帮王八孵化物却不让我去。现在去瞎教什么？何况，当年我“稀饭”学院的同学们都混上中学一级二级教师了，难道去做个工资只有他们三分之一、没编制的代课教师同事吗？我还要脸吗？

我也不想再去做什么街头窜窜，摆个地摊什么的，钱挣不了几个，把人弄得灰头土脸气急败坏的；如果遇到发了情的城管或喝醉了酒的大盖帽，没准小命都难保。我曾亲眼看见这些家伙像“动物世界”里的猛兽攻击食草动物一样攻击在街上摆摊的，连老弱女人们都不放过。像我这样的倒霉蛋，放在体面人的眼里，纯属 TMD 烂命一条，再不敞帚自珍一把，也就眼睁睁看着自己变成一堆不耻于大好形势的狗屎堆了。

父母长住医院，我一人赋闲在家。白天我去股市上晃一圈，套得一塌糊涂，估计几年是出不来了，索性不理它。回家后看看电视吧，千篇一律的新闻和假模假式的电视剧让我忍无可忍退避三舍；看看盗版美国大片吧，那种远离下岗职工生活的玩意儿很快让我厌烦了。其余时间，除了三天两头去医院看看，在医院、单位和社保局为老爸的医药费问题和他们死磨硬缠，就无事可做了。

我常常失眠，实在不知道该干啥。我想起几年前从深圳铩羽而归后极度空虚时写的那本书，一阵翻箱倒柜，那稿子居然还在！我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觉得这小子还有点意思。

一年前北京有个作品研讨会，一个叫什么“追魂”的文化公司发起的。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获得了我的地址，给我发了个邀请函。我一看，除了交通食宿自理，会务费倒便宜，四百九十九块，还可以见到中国文学界一群“大尾巴狼”。我一直想去北京旅游，在京的大学同学杨星辰和李皓也邀请我去。于是带着书稿进京，半是旅游半是开会。两周时间，结识了一大帮五湖四海形迹可疑的文学老中青。研讨会上，一群“大尾巴狼”们吹得我如坠云雾。

这部尚未出版的粗糙作品被冠以“解构性写实”、“后现代”、“黑色幽默”、“囚徒困境”等吓人名词，把我说成一个若经他们调教必将冉冉兴起的文学新星，还假模假式地和我签了出版代理合同，一直没下文，稿件也就扔进了墙角书架。现在，是修改它的时候了，至少我还有些事情可做。

吃饭问题很好解决，我姐新开了个小餐馆，我天天蹭上两顿，风雨无阻。其余时间，我陷入了文字的汪洋大海。

此后一段时间，我还找过雪儿一次，家里聚餐，需要她出场，她没收费。她也来找过我两次，我依然不冷不热地接待了她，她两次夜不归宿，波澜不惊。她忽悠我和她合开茶楼，还想“转正”，我都拒绝了。她几次约我出去玩，我都推掉了。我们家里对她意见不太统一，我父母觉得还行，说她白白净净，又挺机灵；我姐和弟觉得我可以找更好的，按他们的说法，雪儿有些咋咋呼呼。

两月后，将全书大幅修改一遍，感觉好多了。把这手写的稿子拿到了一个打印室，几天来就守在那里校对。为了不至于稿件在某一家出版社墙角发霉，决定自印二十本，同时寄出去。老板在计算器上乱按一阵，开出了一千四的价格。

“七十元一册，比正式出版至少贵三倍，你拿我当猪头啊？”我气晕了。

“你在杂志社干过你知道啊，这个成本主要在排版出片，多印几本没多大关系，一点纸钱而已。你如果印一千册，每册三十元没问题。”老板寸步不让，说得也合情合理。

我看那打字的小妹哈欠连天，趴在桌子上揉起眼睛来，于是减价二百。老板的脸皱成一团，TMD 就跟刚做了包皮手术似的，一阵痛定思痛，终于遇见我倒八辈子霉似的答应了。

一周后我拿到了成品，杂志那么大，印刷清晰，装帧扎实，封面还设计成一叶扁舟帆帆远逝什么的，看起来像模像样的。我笑逐颜开地付了余款，挑最牛逼的出版社一口气寄出去十八本，一本寄给了“追魂”文化公司，一本自留。邮局说自印品非印刷品，既不能走印刷品，也不能走包裹，只能按信纸走，态度坚决，不容分说。一称重量，加上挂号费，一本居然要三十多，五百多块一眨眼就出去了。

我兴冲冲地拿着书稿去医院。刚走进理疗室就觉得走进一个新的磁场，诡秘而阴冷，几个护士正在紧张收拾廖老头的床铺。老爸老妈一脸悲凉，我爸苦笑着说：“见马克思去啦。”

这不过是父母住院一年多来目睹的接踵而至的死亡事件中的最新一桩。沉默了一阵，我老爸询问我这一段时间所作所为，他警告我找点正经事干，别无事生非，把公安局的招来。他的担心不是没道理，我曾经两次把公安招来。一次因为在街上练摊和几个摊主发生冲突，一次因为拒缴保护费和几个资深烂滚龙血拼。两次流血冲突我都幸运地免于治安处分。我拿出书稿：“老爸，您就不能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我在当‘坐家’呢，天天在家坐着，稿子修改完毕。”

我几年前写初稿时家人就知道，我妈和我姐鼓励我，但老爸并不看好我。土八路出身的他对知识分子感情很复杂，一度很鄙视，直到他儿子考上一所“稀饭”大学。老爸翻了翻，只是问了句：“这花了多少钱？”

“二十册，一千块。”我把零头隐瞒了。

这个数字把他们吓了一跳，那年头，猪肉也才三四块一斤呢。

“书已邮寄给出版社啦。”我安慰他们，“打印是为了出版，出版是为了换来白花花的银子。舍不得孩子还套不来狼呢，这点小钱算什么啊。凡事都有牺牲，你们当年不牺牲，哪来今天腐败分子的好日子？”

我老爸一声叹息：“我看你是狗揽八泡屎，泡泡舔不净。”

“你准备怎么办？”我妈话锋一转。

“什么怎么办？”

“你装傻啊？你的工作怎么办？写作能养活你吗？那只是个业余爱好。还有你的个人问

题，我看雪儿还行。”

“走着瞧吧。”我不耐烦地说，撤退了。

“怎么办”是我最为恐惧的一个问题，我 TMD 怎么知道该怎么办啊？谁能主宰自己，连伟大领袖都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呢。你去问问这个国家，它不正摸着石头过河吗？你去问地球，它不围着太阳转吗？你去问太阳，它不在银河系里呆着吗？你去问银河系，它不在宇宙里折腾吗？你去拷问大地，它给你一八级地震；你去仰望星空，它给你屙一阵陨石屎。这些混蛋问题，越问越糊涂，多少圣人仁人庸人都被问傻了问疯了问没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该 TMD 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此后几个月，我将消极的生命消解成积极的吃喝拉撒。约上一帮顽主王文革、冬瓜、亮子等人，马不停蹄夜以继日地混迹于蒙城的餐馆、茶楼、酒吧、歌厅、农家乐和台球厅。我还上驾校拿了驾照，几个现钱折腾光了。

雪儿和我成为一种怎么开玩笑也不生气、偶尔还可以身体接触的古怪关系。几次碰壁后，她再也不提合伙做生意的事了。不久，她混到一家房地产公司做销售，很快做了个小头目。她气色越来越好，穿着也越来越时髦，用上手机了，有时还请我撮一顿什么的，但我始终没有对她发自肺腑的厮混终身的愿望。

我常去医院尽孝，从老爸日益不稳定的病情中预感到一丝不祥气息，特别是回家过年时复发一次后，他自己也觉得越来越糟糕。老爸凝视我的慈祥眼光，愈发掺揉进黯淡无力和悲哀的底色。母亲越来越焦急和无奈，两年的艰难护理透支了她的健康，几十年的伴儿，随时可能离她而去。

入冬后，老爸又一次复发，病情急转直下，失去了语言能力。医生警告情况异常严重，老爸被送进重症监护室，全家轮流守护。我从他断断续续的声音、微微翕动的眼睛和浑浊的泪光中读出了他的人生遗言——怎么办？在他每月千把元工资没后，这个家怎么办？这个二野老兵到死也不明白，几十年前得罪一个局长，他的老伴居然在工作十多年后被无情解雇；他的五个孩子，老大十多年前背井离乡后，在武汉长江大桥桥头上死于车祸，余下四个全部下岗，连我这个寄予厚望的大学生也没逃脱。

我一个在省城的姐率全家赶回来，一些老同事和亲朋好友纷纷前来探视，老爸在太行山里的家人只是来电话电报，他们依然很穷，买一张火车票都吃力。一周后，老爸发生脑溢血现象，陷入昏迷。在清醒的最后几分钟，他把我姐叫到耳边，表达了他的人生愧疚——没把家人生计安排好。他还说，最担心的就是我这个不安分的儿子。

他的组织在他失去知觉后，终于来了。

老爸持续高烧四十一度以上，引发多种内脏并发症。他被插上输液管、氧气管和导尿管推入抢救室，医生正式下达病危通知书。我们通宵达旦地守候，不时在他腿上掐一掐，为他翻身通风，为他吸痰清污，还四处找来冰块袋和冷毛巾进行物理降温。我们徒劳地在他耳边不停地呼唤，不时察看他的眼球变化，梦想奇迹发生。每一次眼球转动，每一次喉结蠕动或轻咳，每一次肢体的细小抽搐，每一次短暂的体温回落，都会让人惊喜若狂，疯子似的找来医生查看。但他的生命体征终究一滴一滴流逝而去……他壮硕的身体终究不敌病魔入侵，生命处于弥留状态。

几天来，我和我弟采取坐在一把椅子上、头部放在床上的睡姿轮流短暂休息，我妈则睡在旁边一张床上。一个清晨，我从老爸病床旁的椅子上醒来，我妈让我先去医院外的餐馆吃饭，吃完回家睡一觉。我作为闲人，连续守护一周，都要崩溃了。蓬头垢面胡子拉碴的我一出大门，连着几个寒噤，头昏眼花饥肠辘辘的我迎风走进一家早餐铺子，狼吞虎咽地喝着热粥吃着凉面。手机突然响了，传来我姐绝望而断裂的哭叫：“爸——爸——不——行了不行了……”

几百米的距离如此漫长，我天旋地转跌跌撞撞地跑回乱成一团的病房。几个医生正在紧

张施救，一个医生使劲按住氧气罩，另一个先用双手做人工呼吸，再用两个电熨斗似的电子心脏起搏器在老爸的胸部规则地按压。母亲几欲昏厥，姐弟们扶住她，紧张而木然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约二十分钟，医生动作慢了下来，查看了脉搏、心电图和瞳孔，终于放弃了。老爸紧闭的双眼忽然流出一行浑浊而滚烫的泪水，他拼出全部力量，奉献出最后一丝生命体征和人生感悟。

这家医院医德尚好，除了中途偷偷请医生护士吃了两次饭，没送一分钱红包。医生说，老爸的生命力非常旺盛，一般中风复发后出现脑溢血很难扛过三天。一些老人说，我这个火焰高、阳气盛的儿子一直在旁边守候，连鬼都害怕；我一离开，病魔乘虚而入，拿走了我老爸的阳寿。

那些我常常见到的老革命们说得不错，他们去见马克思时，至少还有个组织送他上路。的确，老爸的组织派来了一辆破面包车和大卡车，拉走来宾和一车花圈。为了显示公事公办，后来又在丧葬费中扣除租车费。公司那个刚上任的经理，甚至连最后一笔区区二百块钱医药费都不给报销，一本正经说按市上文件那药物属于自费；我找到医院，医院拿出省上文件说应该报销。我晕头转向地被踢了几个来回才明白，原来组织也有神经错乱的时候，便放弃了。

我讨厌假模假式的悼词。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流氓文化，以悼词为最，见得多了。我撰写的家属发言稿与众不同，除了感谢来宾，仅仅抒发了一些生命的荒诞感悟，对于他枪林弹雨出生入死光辉岁月兢兢业业大公无私高尚情操一笔带过；后人的打起精神继承遗志云云，更是一字不提。都 TMD 废话，翻开历史的账目和眼前的事实看看，谁的遗志被继承了？——遗产还差不多。

我没参加追悼会，我陪我妈在家。我搀扶着她站在我家阳台上，隔江遥望天台山密林中高耸的火葬场烟囱里，父亲化为一缕气息升天而去。母亲心如死灰以泪洗面，我五内俱焚，紧咬牙关，一声未吭。

随后的几个月，我无数次冥冥之中梦到父亲，他忧虑的目光穿过夜幕下空旷而混沌的天空俯瞰着我。我承受着一连串泰山压顶般的压力，濒于崩溃，还患上了前所未有的幽闭症和失语症，即使从次年春游时拍的照片看，我的气色仍然非人非鬼。

雪儿工作越来越忙，和我来往越来越少。一次喝茶时，她责备我老爸去世后没通知她，徒劳地安慰我一阵。后来接到她生日聚会的邀请，我托礼品公司送了一个蛋糕，人躲掉了。

一次，在雪儿租的房子里久违的激情后，她提议让我去她公司干，可以给我六百块底薪，我谢绝了。一天下午，我在罗汉路偶遇雪儿，她和本地一个地产大佬很亲密地走出一家酒楼，钻进了豪华轿车。我在暗处，心中五味杂陈。

投稿陆续有了一些反馈。从一些认真回复可以看出，书稿至少没被扔到墙角或垃圾堆，对于我这个只字未发的作者来说，颇获慰藉。有几家说书号用完，或说现在出版萧条，等等看。有几家提出了修改意见，或说性描写有些露骨，或说主调灰暗主人公痞气颓废不能鼓舞人。有几家则提出了出版的可能：一家要我出点“血”，或包销一些书。我冷笑着把这封信扔进了垃圾箱。一家要我提条件，而且是大编辑晨歌亲自来电话，令我受宠若惊。满心欢喜地提出了我的条件：十万元买断。爬格子既是脑力活又是体力活，我觉得我一点也不贪心，他们说一月内答复。然后，我把退回的书稿又邮寄给了次一等牛逼的出版社和几个文化公司。

一个桑拿天的傍晚，植物一样的我坐在阳台的藤椅上看着街道冒汗，发呆，传呼机突然响了，木然一看：“请复北京电话 010……关于书稿。”

我立即进屋拿起电话拨过去，一个女声：“‘星星点灯’文化顾问公司总机。”

我压根没听说过这公司，也不知道书稿怎么到那儿了。管他什么星，能点亮我前程的就是吉星高照。转过分机，自报姓名，又是一个女声：“我是武彤彤，是我呼您的。说话方便吗？”

“方便，您请讲。”我一边说一边坐在床上。

“我是兼职编辑，其实我是一所大学的助教。”

我才不在乎兼职不兼职，能出我的书就是好编辑，我恭恭敬敬：“武老师，认识您很高兴。”

“别叫我老师，把我叫老了，我看了你的简历，咱俩一样大。”她咯咯笑起来。

“当然应该叫您老师了，老师不看年龄，看资历和层次。”

“还是直呼其名吧，只有我学生叫我老师。”她操着没口音的普通话，声音不算细腻，有些硬朗，透着磁性。

“哦，那请说吧。”我避开了一切称呼。

“你的书稿我看完了，我觉得不错。一个新人一动笔就长篇小说，这种例子很少。”

“惭愧，我不是中文专业的，我瞎写。”

“嗨，这跟什么专业没多大的关系，很多作家都不是学中文的，有些连大学门都没进过呢。”

“这倒是，有个别人只认字两三千——还加上错别字，就擅自进行文学创作。”我也笑起来，“我这人很少写错别字，就是废话多，话痨。”

武彤彤说：“废话也得有才啊，看得出来你有强烈的倾诉欲。我就没那么多想说的。我尽量吧，不过出版有三审，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前功尽弃。”

“太感谢了，武老师。”

“别客气。嗨——，怎么又叫我老师了？”武彤彤笑着责备道，稍作停顿，说，“顺便问个愚蠢的问题，别见怪啊。——写的都是你自己吧？”

我愣了一下：“瞎写，不过第一人称而已，我喜欢这个角度，觉得特真诚，尽管驾驭全局有技术缺陷。呵呵，小时候检讨写太多，首先态度要端正，我是当成自供状来写的。”

“哦，难怪够感人的。——你现在干吗呢？”

“正呛水呢——市场经济之水。”我调侃。

“你够乐观的啊，折腾折腾也挺有意思。行了，我今天就说这些，本月内我会再和你联系。”她顿了一下，“忘了一件事，你能不能寄张照片来？”

“要这个干什么？”我纳闷了。

“很多作者投稿时都寄一张来，用来当作者简介。”

我心想这还八字没一撇呢，还是很高兴：“是不是那种做诗人或哲人状——以手托腮眼神迷离的？这样矫情的我可没有，逃犯状的倒有几张。”

“哈哈，那就更有意思了。”她笑，说，“记一个我的手机号，邮寄后通知我一下，我很少坐班。”

逃犯状的毕竟羞于示人。我挑选了一张大学毕业照寄了过去。那是一寸黑白照，看起来颇有五四时期留学生风采。在我最自恋时，恬不知耻地觉得堪比少年周恩来青年汪精卫张少帅什么的。

不久晨歌来电，说如果五万块基本没问题，或者给版税，百分之八，首印两万，我大约能够拿到三万多，如果加印再另算。我装腔作势说考虑一下。

我就像捡了个大钱包的菜农一样，迫不及待地谋划这笔钱怎么花。那时候，虽然一部手机要六七千，但当地房价只要五百块一平米，如果卖他五万，正好一套一百平米的房子，管他怎么办，住下来再说。即使按版税算，三万多也可以添点钱买一套大的或不添钱买一套小的。或者投入股市补仓自救，一旦解套立即出来，这绞肉机可把哥们儿弄痛了。

版税这玩意儿也挺好，涓涓溪流源源不断，没准我就可以像塞林格那样，靠一本书——退休啦。一切似乎好转起来，久违的阳光开始投射进我阴霾的胸腔，食物越来越有滋味，睡觉也越来越少了梦魇。我开始出门游荡，会见朋友，还第一次主动约了雪儿吃饭，以至于她

在电话里说是外星人给她的电话。尽管我和她的关系始终无法确立起来，愈发成为没任何目的的好朋友，这样也挺好。

生活时刻处于失控状态。我回复答应版税条件后，晨歌非常抱歉地说，书稿终审时被盯上了。此人不在出版社工作，文化不高，级别也不高，却是他们的太上皇，拥有对任何稿件生杀予夺之权。我小心翼翼地问我犯什么事了，他说，你不太走运，他们送去书稿，那人恰恰看了我写局长进澡堂子洗桑拿的情节，嗅出了什么，责令枪毙此书稿。

我笑笑，小小处级局长，花几百块钱洗个澡也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嘛。晨歌说，不在于多少钱，而在于你写的那种手法，觉得这干部太齜齜，引起联想了。我说改改吧，晨歌说改了就不好看啦，再说你改了这一段，他还会找出另一段，盯上了就麻烦了。我惊慌失措地问，那可如何是好。晨歌也叹气，过一段时间再试试吧，保持联系。

“过一段时间”，这个中国式不确切说法基本等于没戏了。我陆续给一些出版社打电话，寻找可能性。给他们打电话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那时长途电话费一分钟一块钱。这还不算什么，常常是打过去，总机通了，一半时间没人接，一半是接了转分机，常忙音或掉线，这都要收费。再打，常常重蹈覆辙。即使分机接了，常常要么打错了，要么人不在。出版社不坐班，又重新来一回。你是新人，编辑的手机号码不给你，家里电话更别想拿到。好不容易找到你要找的人，三言两语又说不清。要是遇到一个热心编辑，就在电话里和你谈起来，一谈半小时是常有的事，别人不放电话，你就乖乖陪聊吧。

那几个月的话费单把我妈吓坏了，比生活费还贵呢。我赶紧去股市割肉卖掉少量股票，维持着那一段时间的生活。

我还必须额外弄点钱来。我牌技极差，屡战屡败。台球技术还行，就去台球室通宵达旦地和一帮社会闲散人员赌球，屡有斩获，也累个半死；遇到蛮不讲理耍横赖账的，还引起斗殴事件，我的眼镜就被打坏过一次，差点伤及眼睛。

我有些六神无主起来。我想无论如何不能自费出书，这是我的底线，既出力又出钱还讨骂，跟 TMD 嫖客似的。我又不评职称，社会活动家不需要什么狗娘养的职称。

我再次笼罩在让我无处逃遁的“怎么办”梦魔下。蒙城算是混不下去了，我的前景和这个城市的名字和天气一样不明朗。给李皓和杨星辰打电话，问像我这样不可多得的人才，在北京能混成什么样。他们唧唧歪歪半天，总算说了一句正确的废话——就看你怎么发挥了。杨星辰从外贸公司辞职后自己创办公司，正处于艰苦发挥阶段；李皓两年换了五个工作，看来发挥得很不稳定。

“你哪像逃犯啊？斯斯文文的。”收到我的照片后，武彤彤在电话里说。

我信口开河：“如果你把地球看成一个大监狱，每个人都是犯人。”

“那倒是啊。”

说起稿子，她很歉意，我也预料到了。没有料到的是她鼓励我去北京闯闯，还说可以帮我一把。一个朋友想开书店，资金有点紧张，想找人合资。这主意倒不错，余下就是多少资金的问题了。武彤彤说：“钱多开大店，钱小开小店，有二十万就够了，也就是说你要有八九万就够了。”

“这个——，我的钱套在股市了，暂时出不来。”我为难的口气。

“哦，那你考虑一下，如果有兴趣的话，不妨来北京考察考察。”

“我想想吧。”我又补充道，“怎么让我和你朋友合作啊？和你合作不更好吗？”

她笑起来：“我倒想，可惜没机会了，我要出国了。”

“出国？”

“是的，我去美国读书，刚拿到签证。”

“恭喜恭喜！老公在那边吧？”

“什么时候你给我找来一老公？你干脆开婚姻介绍所得啦？”武彤彤爽声大笑。